

《90年代地理学》笔谈

关于中国地理学面向世界的几点思考

陆 诚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南京大学大地海洋科学系)

地理学研究关注的范围包括地球上所有人类活动的空间,而地理学最终致力的目标是全球人与环境的协调和综合发展——包括自然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等诸多方面的和谐。自从80年代初李旭旦先生等呼吁复兴人文地理学以来,我们对于以人地关系为中心的地理学统一性观念开始出现了初步的共识。这一共识的达成对90年代乃至今后中国地理学发展会有重大意义。本文想在上述共识的基础上,谈谈与此相关的中国地理学面向世界的问题。

我们知道,地理研究一方面是与“地方”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地理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全球人地关系的协调和综合发展,它无疑又具有世界性。这二方面是完整的统一,不可分割。正象改革开放政策一样,中国地理学独特的地方性会愈来愈受到世界各国地理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但是,这样的地理学应当是兼具全球观和国家特色的地理学,这一点是我们讨论未来中国地理学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从目前流行于国际间的主要地理刊物、地理团体及地理学会议中,我们也许得承认这样的事实,即当前国际地理学界的主流声音是来自于欧美国家,并且在人文地理方面,欧美国家自70年代以来朝着非传统地理学的方向发展。由于在国际地理学界充斥着他们的声音,使我们受到干扰,比较难以认清未来地理学真正的前进方向。但在另一方面,彼此的交流和合作又势在必行。当中国地理学经历了一段自我发展的过程面向世界时,面临着的是一个与30、40年代绝然不同的国际地理学研究环境。面对当前欧美国家流行的所谓新人文地理学,我们该作怎样的应对?是忽视它们的存在我行我素,还是寻求合作,把我们的声音送出去,并力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战略。我们先从以下三方面认识一下欧美地理学成为主流声音和朝着非传统方向演变的原因。

第一,近代地理学起源于西方,且欧美国家地理学与第三世界国家地理学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前者较多强调世界性,后者侧重地方性。以欧美为例,近代地理学的发展最早是与地理探险和殖民扩张联系在一起。二次世界大战,又为地理学家们提供了新的课题。地理学家的眼光较多侧重在国际方面。战后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6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的加深以及70年代后在称之为边缘区(periphery)中“新兴工业国”(NICs)的涌现和称之为核心(core)中老工业区的衰退等,许多西方地理学家开始兼顾地方性问题,并在理论上尝试运用政治经

济分析的方法对传统地理学进行反思,从而加强了对社区和小区域问题的研究。许多地理学家认识到,不同空间分异的地理研究相互是有联系性的,地方性和世界性是相对的。这在1992年圣地亚哥美国地理学年会上得到佐证。会议特别邀请了著名学者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作大会报告,介绍他“世界体系”的理论。其实“世界体系”论(World system)和有关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早已有之,并在客观上对西方地理学产生了不少的影响。世界体系表现为二组空间相关的三重分异:水平分异——核心区(core)、边缘区(periphery)和半边缘区(semi-periphery);垂直分异——地区性(Local)、国家性(national)和世界性(global)。而在世界性的尺度上,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统一市场,在这个市场中贫国与富国的交换一般说来是不平等的。但为了寻求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市场的交换又是难免的。一旦与这个世界市场发生联系,但会产生互动影响。尽管他的理论在西方还备受争议,但他的“世界体系”结构则已普遍得到承认,并经过80年代末地理学家对“结构和机构”(structure and Agency)的理论讨论,世界性与地方性相结合的研究广受重视。愈来愈多的地理学家采用这种构架(frame)来分析地理问题。例如,同样被这次大会列为大会报告人的著名工业地理学家斯科特(A. Scott)就试图建立空间上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工业类型系统:工厂(plants)→公司(firm)→综合体(complex)→企业群(agglomeration)→区域(region)。所有这些单元的经济活动都可延伸至国家乃至国际层面。跨国公司(TNCs)作为国际间资本的联系,使经济活动的形式更趋多样化、复杂化。地理学家可以从这些不同单元的空间关系上来分析其技术系统、市场关系、管理、竞争机制和立法等并从而找到解释。在农村发展研究中亦是如此。有些学者(如M. Watts, S. H. Potter等)把农户(Household)设定为最基本的分析单元,并通过农户、村社、区域等各级单元来研制农民-国家-资本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最终可能在国际尺度上作更深入的研究。特别在南美国家的合作农业中(Contract farming),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十分地广泛,并与外国资本和市场的联系非常紧密。近年来出现的有关“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讨论,同样是在全球尺度上探讨农业和农村发展,以及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可见,地方性和世界性相互兼顾联系是欧美地理学近今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第二,由于西方地理学的“先入为主”,在欧美地理学界似乎存在着一种假设,即欧美地理学走在时代前列,并设定其他国家地理学的发展或多或少在重复他们已走过的路。我们知道,战后以来欧美国家地理学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50年代以哈特向(R. Hartshorne)为代表的区域功能派;2)60年代以谢弗(F. K. Shaefer)为代表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地理学包括数量地理和科学地理学;3)70年代以来以现实主义(Realism)和马克思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人文主义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者眼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地理学处在上述第一和第二阶段的进程当中,有的则在科学地理的发展阶段(如中国)。而作为科学地理学哲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在两方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判,其最大的不足被认为是忽视了对社会文化等深层问题的分析。例如,在西方规划学界,有了对物质规划(physical planning)的批判,在地理学界上出现了对于计量地理学的批判并出现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激进地理学的新思潮。中国地理学如何应对这种新趋势以及是

否有必要经过上述第三阶段的发展尚有待讨论。不过,中国地理学要向纵深发展,需要超脱某些旧有和现有的框框,在中国开发文化方面,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研究等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第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地理学这些年来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直缺少理论创造和系统总结,往往陷入过份实用和自我发展的狭窄圈子。这对地理学未来的发展不利,对地理学服务于社会、服务全人类的长期目标的实现不利,而且过份的“务实”对于第三世界地理学真正加入国际主流社会也是不利的。要改变这些状况,需要我们知己知彼,跳出自我发展的圈子和加强理论建设工作。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大国,应负重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增加力度来向西方地理学的权威挑战。

由上可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以洲美地理学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环境。我们应当重视这种客观存在,并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应之。中西方地理学之间并不是水火不容、“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欧美地理学的发发历程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借鉴。同时,欧美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有可能相互取得共识,寻求一条共同发展的道路。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西方人文地理学孕育的环境和它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局限性,以及发展我国地理学的实际条件和要求。

总之,东西方地理学之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应成为彼此交流的障碍。中国地理学已不可能关起门来单干,必须考虑与国际社会的兼容性,必须“合流”。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西方地理学是主流而盲目地“合流”。未来我国地理学的发展需要制定一个全球战略,能够协调和组织我国庞大的地理研究力量,在进一步加强充实提高地理研究水平的同时,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

改革开放为我国地理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十分良好的契机。钱学森关于发展地理科学的意见,吴传钧先生等关于地理学动态的分析讨论等,都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建立理论体系和加入国际社会,应视为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方面。